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郭英剑教授

欧美高校博士论文盲审制度有何启示

■郭英剑

在本专栏往期文章中,我提到了国外高校的博士论文审查情况。那么,欧美大学中是否也有博士论文的校外盲审机制?如果有,它们是怎么做的?如果没有,原因何在?它们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说有何可借鉴的方面?

美国高校:几无校外盲审程序

在美国大学,博士候选人进行最后的口头答辩之前,既无须经过类似于学术期刊文章的正式的同行评审,也无须像我国这样专门邀请校外专家进行评审。换言之,美国绝大多数高校并无博士论文的校外盲审程序。那么,它们如何保障博士论文的学术质量,如发现问题,又该如何处理?

美国高校的博士论文主要由论文委员会进行审查和评估。该论文委员会成立及其审查与评估的基本流程如下——

委员会成立。博士生的课程初期,学生会选择一个论文委员会,该委员会通常由其导师和几位教师(一般最少2位,通常来自本系,但有时也包括其他院系成员或校外专家)组成。

论文开题答辩。在开始完整的论文答辩前,学生通常须提交开题报告,并针对其研究计划进行答辩。论文委员会将对此进行审查和批准。

持续过程指导。在论文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学生与其导师和委员会成员密切合作。针对博士论文,他们会提供反馈意见,提出修改建议,确保学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提交答辩终稿。学生完成论文后,将终稿提交给委员会审核。学生进行答辩的前提是,该论文必须符合委员会的标准。

由此可见,论文的写作过程由论文委员会所组成的专家组负责,而非导师一人负责,尽管导师付出更多在情理之中。

进入答辩之后的环节与国内无异。论文委员会一旦通过了论文,并认为一切准备就绪,便会让博士候选人进入答辩环节。答辩期间,学生介绍自己的研究,并回答委员会成员提问。答辩通常对其他教师开放,有时也对学生开放并允许其提问。答辩结束后,论文委员会讨论学生的表现和论文质量,并决定是否通过其答辩,是否需要修改,或者在极少数情况下对学生的答辩不予通过。

以上为论文的审核程序。据我所知,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一些美国顶尖高校都很看重论文委员会之于论文的意见,反而并不看重答辩过程。

在一些顶尖高校,毕业生只需要提交论文委员会认可的博士论文全文,甚至无须进行答辩,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

即便有答辩,也往往是一次学术交流的过程,甚至是即将诞生一位博士的庆祝时间。至少我见过的美国人文学科的博士论文答辩,学术探讨是目的,轻松、愉快是基调,庆祝、道贺是结果。

美高校不重视校外盲审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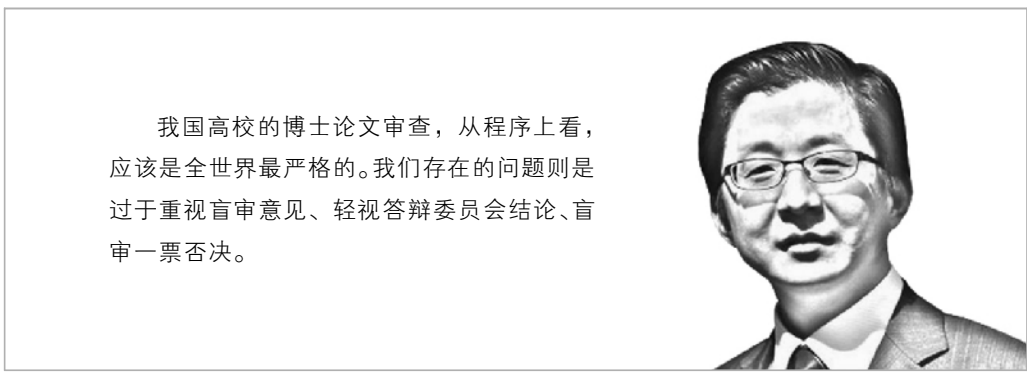
那么,美国高校是否有聘请校外专家对论文进行评审的“例外”呢?答案是肯定的。

有些大学也有可能让外聘的评阅人(不属于论文委员会)对学位论文进行评估。这些人通常是博士论文领域的专家,他们会提出审查意见,但这既与学术出版界的同行评审不同,也不会产生否定性结论,进而导致论著不能发表或出版,也不像我们的盲审结果那样起决定性作用。

如果一所大学使用了校外评审人,其反馈意见可能会产生影响——他们可能会提出修改意见,甚至建议论文暂缓答辩,但最终决定权在论文委员会手中。

美高校之所以没有正式的同行评审,或者严格地说,并不重视校外评审的原因,在我看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论文委员会就是专业监督。该委员会由相关专家组成,他们可以针对学生的具体研究



我国高校的博士论文审查,从程序上看,应该是全世界最严格的。我们存在的问题则是过于重视盲审意见、轻视答辩委员会结论、盲审一票否决。

领域提出详细、专业的反馈意见。

其次,重视过程指导。无论是导师还是论文委员会成员,他们的持续指导就是要确保博士生的研究工作走上“正轨”,从而减少研究结束时出现重大问题的可能。

最后,注重效率。类似期刊论文的同行评审一般耗时较长。在大学,特别是在博士生毕业季,将论文交给同样极为忙碌的专家,且要等待其评语,要想在短时间内完成并不切合实际。

总之,美国高校中,论文委员会拥有一对一篇博士论文的最终决定权。该委员会的持续参与以及开题答辩、预答辩或答辩等提供反馈和修改意见的结构化流程,可以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

欧洲高校的基本程序

欧洲大学的博士论文通常采用与美国大学相似的审查流程,但也有不同。而且,欧洲的不同国家之间,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院校之间,其程序也不同。

与美国相比,欧洲博士论文审查程序的共同点在于,欧洲的博士生通常也有一个论文委员会,包括一名主要导师(指导老师)和其他教师。学生与导师和委员会成员密切合作,后者会不断提供反馈意见,确保研究工作按计划进行。

此外,在开题阶段,许多欧洲项目要求学生论文研究之前提交一份研究计划书。该计划书必须获得论文委员会的批准。

与美国相比,欧洲制度的差异性则体现在欧洲高校较多地依赖校外评审。

比如在英国,博士论文通常由该领域的专家(不隶属于学生所在的大学)承担外审任务。这些外审人员在评估学位论文的质量和严谨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德国,学位论文由内外部评审专家共同评估。学生必须通过口试或答辩。在法国,博士生在口头答辩前,必须由至少两名外部评审专家对其论文进行评审。这些评阅人提供的书面报告会在答辩时宣读,并成为是否授予学位的依据之一。

那么,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何在?首先是历史和文化因素。在欧洲各国,其博士学位授予程序的差异受到各自历史、学术传统,以及各国特有文化因素的影响。

其次是监管框架不同。欧洲大学通常根据各国的国家教育法律和法规运作,这些法律和法规对博士学位的评估和答辩提出了具体要求。

最后是高等教育体系的多样性。欧洲的高等教育体系多种多样,反映了欧洲大陆不同的教育理念和实践。

总的来看,虽然欧洲和美国大学的博士论文审查程序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欧洲普遍采用外部评审制度,博士论文需通过外部专家评审,确保其学术质量和公正性,而美国则更多依赖内部评审,由指导教师和校内委员会评审论文。

欧美高校的博士生申诉机制

在欧美高校,如果博士论文盲审被否定,

学生通常都有申诉的机会。具体的程序和机会因学校和国家而异,但一般包括以下两个步骤。

一是内部申诉。学生可以向系主任或研究生院提出申诉,请求重新评审或外部评审。学校通常会有一套正式的申诉流程,学生需要提供详细的申诉理由和相关证据。

二是外部评审。在某些情况下,学生可以请求由外部专家重新评审论文,以确保评审过程的公平和公正。

在英国,学生可以通过大学的正式申诉程序请求重新评审,特别是在认为评审过程存在不公或错误的情况下。具体程序通常包括提交书面申诉、参加听证会等。美国不同大学的申诉程序各有不同,但一般会向研究生院提出正式申诉,并可能需要通过学术委员会的评审。

在欧美,这类案例大都不会公开,因此人们很难获知其中的具体做法。但在一些知名大学,学生因评审过程中的程序性错误或评审意见不一致而申诉,并最终获得重新评审或通过的情况并不少见。

欧美高校经验的启示

回过头来看我国的博士论文审查制度。虽然人们对当下的盲审制度及其带来的影响多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我国高校的博士论文审查,从程序上看,应该是全世界最严格的。我们存在的问题则是过于重视盲审意见、轻视答辩委员会结论、盲审一票否决。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内高校可以借鉴欧美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首先,强化论文委员会的职责。在欧洲,外部评审结果是答辩的重要参考,但论文委员会仍然有最终决定权。这就确保了论文委员会的独立性和重要性。

因此,我们也应更加明确和强调论文委员会的职责,特别是在盲审后,明确论文委员会在最终评审中的角色。应该把盲审结果作为参考,而非决定性因素,从而确保论文委员会能够综合考虑论文质量和答辩表现以作出公正决定。

其次,改变盲审一票否决制度。欧美国家更重视多元化评审标准,常采用综合评审,评审结果由多名专家综合评分,减少单一评审意见的主导性。

我们也可以在现行多元化评审机制的基础上,设立综合评分机制,盲审评审意见只作为综合评价的一部分。还可以引入多名评审专家,通过评分和意见汇总决定论文是否通过,避免一票否决。

最后,建立完善的申诉程序。我国可以借鉴欧美的申诉机制,建立完善的申诉程序,确保学生在面对否定的评审结果时有公平的申诉渠道。

这不仅有助于保护学生的权益,也能提高评审过程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并增强学术评审的公信力和公正性。

总体来看,如果我们能够借鉴欧美审查制度的长处,优化自身的博士论文盲审制度,确保评审过程的公正性、透明度和科学性,就可以提高博士论文的整体质量和国际认可度。

李锋亮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院长副教授

近几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如火如荼,高教界已公认其将对教育系统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乃至冲击。特别是研究生教育阶段,目前大家普遍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存在许多潜在伦理风险,但与此同时也都认可该技术将提高针对研究生的教学、科研工作效率。不过,除此之外,目前较少有人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研究生导学关系带来的影响。

事实上,作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导师是对研究生实施“三全育人”的重要主体,因此非常有必要前瞻性地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给研究生导学关系带来的影响。

具体而言,这种影响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

在积极影响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为导师指导研究生提供许多便利,比如帮助导师制订指导计划、生成教学内容等。这些便利对导学关系的影响是正面的,因为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导师的工作效率,减轻了导师的指导压力,提高了导师的指导质量。

花费更少时间,获得更高的指导质量,这对导师和研究生双方来说,无疑是令人愉悦的体验,导学关系由此可能变得更加和谐。

当然,这种积极效应建立在合理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之上——假设研究生对人工智能技术持接受态度,并能将其运用于自身学习和科研中,那么该技术就会给研究生带来诸多便利,如帮助其制订学习计划、查找文献资料、进行学术写作等。

这些便利对导学关系的影响无疑也是积极的,它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研究生构建从事科研工作所需的学科专业知识体系,提高学习和科研效率及导师对研究生的满意度,进而促进导学关系和谐发展。

在消极影响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存在弱化和破坏导学关系的风险。因为在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时,导师和研究生都不可避免地要在是否接受新技术上作出选择。当双方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态度不一致时,便可能导致导学关系紧张。

所谓“态度不一致”,主要指的是导师反对热衷于新技术的研究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师生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可能由此产生。

即使导师和研究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抱有相同态度,技术仍然可能对导学关系产生消极影响。比如,双方虽然都能接受生成式人工智能,但由于研究生学科专业知识体系尚不完善,更易受到生成式错误或歧视性输出内容的误导,导致不能很好完成科研任务,甚至在无意中出现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这都会大大降低导师对研究生的满意度,甚至导致双方的信任关系破裂。

反之,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如果研究生更有经验与优势,则会增加研究生质疑导师权威的可能性,使得导师在导学关系中的主体地位下降,进而导致导学关系产生疏离、隔阂甚至破裂。

在最大程度上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导学关系积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遏制其对导学关系的消极影响。在这方面,笔者提出如下几条相关建议。

首先,在使用人工智能协助开展科研工作时,导师和研究生都应谨慎对待其输出的

促进导学关系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发挥积极作用

内容,并对输出内容进行严格鉴别。具体而言,师生双方要提高多渠道信息检索能力,对多渠道来源的信息进行对比验证;对争议性问题,应尽量采信权威性更高的文献;对有疑义的内容和观点,应与其他研究者展开充分的交流和讨论。

其次,师生双方都应自觉秉持更高的学术伦理规范。当下,人工智能技术使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具有了更强的隐蔽性,从而增加了研究生甚至导师自身错用、滥用人工智能实施学术不端行为的风险。因此,在面对新技术时,师生双方都应自觉遵守比以前标准更高的学术伦理规范,加强自觉性。

这方面,高等教育机构务必加强针对导师和研究生正确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法与学术道德伦理的培训。

最后,导师与研究生要坚持定期、全方位、充分沟通。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提高学习、研究与导学的效率,但如果师生之间缺乏交流,便极易造成导学关系的疏离。

应对这种负面效果的最好方式,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保证导学沟通频率不下降。

在研究生教育中,周期性的组会往往是师生交流、沟通的通行形式,因此组会制度要在研究生教育中强化。此外,导师和研究生应开展多种形式(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沟通交流,以提高导学亲密度,避免人工智能技术对导学关系的疏离。

总之,导学关系是研究生教育中最重要的关系,务必要采取前瞻性的分析与措施,不能让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这一关系造成负面冲击。研究生、导师和高等教育机构应形成合力,使得生成式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和谐导学关系的生成而助力。

(本文为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课题“对全国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的追踪调查”(课题编号:2022THZWJC29)研究成果)

“新工科 + 思政”教学创新可“三管齐下”

■赵原

高等教育在教育、科技和人才“三位一体”的战略布局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以,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将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主题之一。

新工科建设是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战略行动,旨在培养新兴领域工程科技人才。加强大学生的思政教育,提升思政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是贯彻落实“新工科”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然之举。

鉴于当前高校对新工科课程思政的挖掘还不够深入、思政元素存在一定“硬融入”与“表面化”现象,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探索“新工科 + 思政”教学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新工科”教育虽重视将思政内容合理融入教学,以此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但在操作中仍存在一定困难。一是“新工科”的课程性质导致其较难与价值观塑造相联系。新工科课程的理论性、技术性和专业性较强,且具有一定抽象性,加入思政教育内容的确面临操作上的挑战,需要

处理好学生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和实施思政教育之间的关系。

二是从“新工科”教育内容中引申出的思政知识点较零散,如若不能以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相串联,将导致两者的融合缺乏逻辑,无法形成体系,不利于学生整理、记忆,也难以升华课程内涵,推动育人体系格局性变化。

正因如此,如何将“新工科”与思政教学更好结合,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通过跨学科融合,将与“新工科”相关的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内容相结合,形成跨学科的教学体系。这一过程中,一是要以全局思维确立课程思政目标。教师需要思考如何将“新工科”相关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内容有机结合,实现两者在教育过程中的相互促进和共同提升。例如,创新精神不仅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也是“新工科”人才必备的精神特质,教师可在知识讲授中,通过增加探索性、试错性、实践性内容,着重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训练,以完善“新工科”课程思政内容体系建设。

二是要构建起学科融合的框架体系。“新工科 + 思政”并非工科类学科与思政教育的简单叠

加,而是要做到融合贯通、相辅相成,以实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有机统一。要将思政教育的要求融入“新工科”人才培养方案,有力借鉴工程专业认证和评估体系思路,立足于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系统性规划教学目标、明确产出效果、实施达成度检验,避免“新工科 + 思政”出现“两张皮”与“形式化”现象。要围绕学生专业素养及基本素养培育,结合不同学习阶段特征,把握好“新工科”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思政内容融入的侧重点,以构建相互支撑、相互衔接、层层递进的课程体系。

三是要增强“新工科”中融入思政内容的精准性。教师可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工业方面的案例事件或实际问题,为学生讲授其中工科知识的同时,引导他们深入思考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道德责任等思政元素,以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例如,在分析“中国高铁”的建设过程时,除讲解一些工科相关知识外,教师还可引入团队合作、责任担当等思政元素,让学生在建立对工程实践认知的基础上,深入理解工程技术的根本是要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进而激发其专业荣誉感与行业自豪感,增强其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意识,自发培养和形成合作能力,用青春书写时代华彩篇章。

同时,以多重维度挖掘课程思政资源。要想在“新工科”教育中融入更多思政要素,丰富的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必不可少。教师需要从多维度深挖这些资源。

一方面,可从家国情怀角度挖掘。“新工科”教学内容涉及诸多新兴技术,这些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均是为国家战略部署服务的。因此,挖掘课程思政教学资源首先应深入阐释其中的爱国主义情怀。

例如,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取得的重大成就,既是当下的热点话题,也符合当下所提倡的新发展理念。因此,可以在教授“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知识的过程中融入“贯彻新的发展理念”“爱国主义情怀”等思政内容,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另一方面,可从个人理想信念角度挖掘。“新工科”专业所研究的技术旨在为人类服务,是将个人价值寓于社会价值之中的重要彰显。因此,可通过挖掘那些有着崇高理想信念的科技工作者、战略科学家的人物事迹,开展“新工科”课程思政教学,以激发学生树立远大理想信念,将自我理想同国家前途命运联系起来,以青

春之我为民族复兴添砖加瓦。

最后,结合课程思政资源特征创新“新工科”教学方式。要想让课程思政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需要根据课程思政资源的特点,设计有利于学生接受和受益的教学方式。

其一,进行启发式引导教学。教师需充分研究,高屋建瓴地进行启发式引导。比如,可让学生自主查阅资料 and 开展调研,并在课堂上以集体研讨的方式让其交流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适当进行启发式引导,让学生体会其所了解的新兴技术发展应用和国家战略之间的联系,进而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

再如,结合有关教材或内容设立一系列问题,承上启下活跃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从而营造一种强烈的课堂求知气氛,让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解决问题。

其二,进行互动交流式教学。教师可通过观看人物事迹纪录片、国家技术崛起等相关故事片营造课程思政教学氛围,并让师生、生生间积极开展交流互动,在开放情境中潜移默化地实施思政教育,以实现“头雁效应”向“全员参与”、“典型案例”向“课程蓝本”的转变。

(作者单位:常熟理工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